

元代山西的人口变动

瞿大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关于有元一代的人口问题,不少学者已在全国范围,甚至腹里地区进行过一些研究,间或涉及到山西地区。^[1]但是,对于河东山西出现大量人口的死亡减损,以及人口流徙迁出与流入定居所出现的显著变动,尚未有人作过专门论述。本文基于有关研究成果,试对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社会人口的总量及其分布、流徙迁出、流入定居以及元末人口的变化状况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 元代; 山西地区; 人口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一

根据《中国人口》(山西分册)的查考统计,晋南地区从远古时起就是人口增长较为明显的地区之一。西汉平帝初年,山西地区的人口记载已经达到 601,943 户,2,527,368 口。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实行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致使全国人口出现新的增长。隋炀帝时,河东山西的人口达到 854,487 户,约 3,850,000 口。唐初,全国政治形势稳定,赋税较轻,经济繁荣,山西地区的社会人口在经过较大损耗以后开始恢复,数量回升为 633,257 户,3,803,403 口。宋代,由于在政治、经济上采取强化中央集权,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增加人口等各项措施,河东山西的社会人口到宋徽宗时为 804,835 户,3,231,910 口。^[2]

金朝在太行山以西地区,设有西京路、河东北路与河东南路,其中,以西京为中心的西京路,所辖面积较为广阔,包括当今内蒙古中部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以太原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为河东北路;以平阳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为河东南路。这三路之间的人口数量相差很大,有的地区是人口分布的密集地带。《滏水集》提到,“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则物力多,赋税重,此古所谓狭乡”。^[3]韩茂莉所著《辽金农业地理》之中依照《金史》对金代人口做过统计分析,兹将其表引列如下:

金代山西地区的府、州户数及其人口密度^[4]

路份	州府	户数	人口密度(人/kmm)	州府	户数	人口密度(人/kmm)
西京路	大同府	98,444	22.4	武州	13,851	26.0
	朔州	44,890	73.1	应州	32,977	58.8
	云内州	24,868	12.8			
	太原府	165,862	61.7	忻州	32,341	70.6

河 东 北 路	平定州	18,396	24.4	汾州	87,227	128.8
	石州	36,528	24.0	代州	57,690	34.3
	隰州	7,592	36.4	宁化州	6,100	16.3
	岚州	17,557	20.6	岢岚州	5,851	14.0
	保德州	3,191	19.1	管州	5,881	26.9
河 东 南 路	平阳府	126,936	101.1	隰州	25,445	18.8
	吉州	13,324		河中府	106,539	170.0
	绛州	131,510	157.0	解州	71,232	75.1
	泽州	59,416	40.0	潞州	79,232	50.7
	辽州	15,850	15.2	沁州	18,059	15.2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金代山西各地的户数及其人口密度很不均匀。西京路有 215,030 户，人口密度相对较小，河东南路有 647,540 户，人口密度相对较大，河东北路有 444,216 户，人口密度居于中间，三路共有 1,306,786 户。

在蒙金战争中，山西地区社会人口的减损极大，锐减惊人。其间，蒙古军所到之处，“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5]在这种战时政策下，“凡城邑以兵得者”^[6]，不是遭到野蛮屠戮坑杀，便是“比屋被诛，十门九绝，孑身不免，万无一存”^[7]，遂使生灵涂炭，伤亡极大。贞祐二年（1214），蒙古军攻入河东山西，“汾、石、岚、管，无不屠灭，唯岢岚无所而还”。^[8]根据《大阳资圣寺记》所载，金代泽州有户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六。是年二月，“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毁圯，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兵火以后，晋城“居民荡析，乡井荆棘”。^[9]在蒙古军从河南回师之时，河朔之间“城郭为墟，暴骨如莽”。^[10]

除了大批屠戮坑杀之外，蒙古军还在山西地区俘获掠夺大量人口作为奴隶私属。贞祐二年（1214），寿阳县在蒙古军攻略以后，“残民无百家之聚”。^[11]辛巳（1221），蒙古军下河东，“泽、潞居民半为俘虏”。^[12]因此，河东山西的社会人口出现所谓“丧乱以来，僵仆于原野，流离于道路，计其所存，百不能一”的耗损状况。^[13]当时，大批民众逃出山西地区，有些一去不返，造成“河东百姓掳掠殆尽，城邑四野为之一空”。^[14]

乙未（1235），蒙古汗廷遣使往诣诸路料民。泽州司县共得九百七十三户，司侯司六十八户，晋城二百五十五，高平二百九十，陵川六十五，阳城一百四十八，端氏一百一十七，沁水三十。壬寅（1242），续括漏籍，通共实有一千八百一十三户，约合金代人户的 3%。这种人口锐减状况“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其可知也”。^[15]

然而，山西地区的地理条件便于居民分散隐蔽，不利于蒙古骑兵追捕搜索和大批屠戮，有的州县“恃险不降，王师至则藏匿山谷，去则复出，众庶颇安”^[16]，所以河东山西从总体上与华北平原地带相比，当属社会人口损失较少的特殊地区。

大蒙古国时期，蒙古汗廷在中原汉地开始进行人口统计。元太宗五年（1233）始括中州人户，得七十三万余。七年（1235），下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得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八年（1236）夏六月，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元宪宗二年（1252），又籍人户，增户二十余万。至元七年（1270），经过籍户，增三十余万。^[17]由于当时户口种类复杂多样，人

口统计仅按当差赋役的民户数量而定，军户人口、影占人口与驱口私属等类人户通常不在统计范围，造成人口的统计数量与实际数量相比往往较少。^[18]

对于中原汉地的军民人户，元人王磐的《忠定郝公神道碑铭》载到，“皇朝肇造区夏，分汉地城邑军民，立九万户府。每府所统郡县不下二、三十城，户不下一、二十万”。^[19]王恽的《玉堂嘉话》则记载为，至元七年（1270），“天下军民并析居总二百三十万”。^[20]通而观之，元宪宗二年括户总量比起王磐记载军民户数为少，王恽所载至元七年军民人户总数二百三十万又较王磐记载为多。由于元宪宗时籍户总数没有记载与王磐所载军民户数的年代不详，所以王恽所载至元七年军民人户的总数较为明确，即中原汉地的人户总数约达二百多万。

尽管人口统计并不准确的问题在有元一代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乃至元末至正年间仍有“质良人为奴逾四十载”的影占情形。^[21]但是，亦应看到元统治者为了确保赋税征收的有效进行，较为重视整顿户计，确定民籍，还在检括户籍中对漏籍人口采取严厉的检括查禁。这种检括查禁不论官民一概如此，同时采取鼓励告发的检举措施，甚至对于漏查无籍的为奴人户进行检括。

乙未（1235），蒙古汗廷敕命断事官耶律买奴“括诸道户口”，“以籍为定，互占它县以死论”。时有潞民常氏避役，藏匿河内王帅家中。事发之后，有司乃将王帅抵常以死。^[22]即使窝阔台汗前赐山西大达鲁花赤速哥的人亦在籍户中被括入官籍。^[23]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立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24]三月，山西宣慰使李德辉对“权势之家籍民为奴”的近千人，放免为良。^[25]至元元年（1264）二月，忽必烈对贺福等六人告发平阳、太原漏籍人户，“诏赏以官，廷臣以非材对，给钞与之”。^[26]至元二年（1265），中书省以“上都、北京、西京、隆兴、平凉五路户计为有争差”，曾钦奉圣旨拟“各州县管民官勾集元主并驱户一同对证”，专门进行当差人户的查实确认。至元九年（1272），太原路有管民官影占隐藏十一户民，受到惩处。^[27]至元十六年（1279）五月，因为五台山多匿逃奴及拖欠赋税之民，忽必烈敕西京宣慰使司、按察司搜索之。^[28]至元二十六年（1289）五月，尚书省臣上言：“括大同、平阳、太原无籍民及人奴为良户，略见成效”。^[29]

忽必烈即位以后，实行恢复发展农业、手工业的施政措施，将“户口增”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标准，促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人口数量逐渐增长。其间，山西地区的人口增长从一些县份由省并转为重新立县的有关记载可以得到相互印证。例如，至元年间，忽必烈敕令诸县“编户不满千数者省并”，以纾民力。至元三年（1266），万泉并入猗氏。至元十四年（1277），县人皇甫祐以户满千诉于省部。至元十六年（1279），万泉复立为县，隶河中府。^[30]至元三年（1266），乡宁县并入吉县。至元二十五年（1288），乡宁奉旨“依例复立”。^[31]武乡初止七百余户，以例罢废，并入铜鞮。至元三十年（1293），由于武乡户及千余，复立为县。^[32]《武乡县志》则记载为，元贞二年（1296），武乡县户约千余，县治复立。^[33]

当时，山西地区有些府、州、县的人口数量发展较快，进一步显示出社会人口的增长状况。至元初年，平阳已经“地狭人众”，因常乏食，以致需要“上党之粟”的输入接济。^[34]临汾“剧而最要”，“占籍者数万五千户”。绛州“总六县以三万户，为河东冠”。^[35]榆次小县有“众且万人”。^[36]

从《永乐大典》的记载看，至元九年（1272），太原路人口已达 89,711 户；平阳路人口达到 107,506 户。^[37]《元史·地理志》则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西京路为大同路，有 45,945 户，128,496 口；大德九年（1305）以地震改太原路为冀宁路，有 75,404 户，155,321 口；同年，以地震改平阳路为晋宁路，有 120,620 户，270,121 口。上述有关史料显示，在至元二十五年到大德九年之间，山西地区三路人户的总数约为 241,969 户，人口总量约为 553,938 口。虽然河东山西的人口密度比起金代大为下降，但是，三路之间人口密度的大小顺序依旧与金代大致相同。

元朝时期山西地区的人口数量及其人口密度^[38]

路份	年代	人户数量	人口数量	人口密度 口/kmm
大同路	至元二十五年	45,945	128,496	1.81
冀宁路	大德九年	75,404	155,321	2.64
晋宁路	大德九年	120,620	270,121	3.8

入明以后，山西地区的行政设置发生变化，且进行过查籍编户与人口统计。洪武二年（1369），置山西等处行中书省，治太原路。洪武三年（1370），置太原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洪武八年（1375）改都卫为山西都指挥使司。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五，直隶州三，属州十六，县七十九。东至真定，北至大同，外为边地，西南皆至黄河，与陕西、河南为界。洪武二十六年（1393）编户五十九万五千四百四十四，口四百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七。^[39]

根据统计可以看出，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社会人口经过战乱屠戮与社会动荡，出现大幅锐减。这种锐减不仅造成元代中期国内局面稳定以后的人户数量仍然远未达到金代人户的总数，就是直到明洪武二十六年依然没有达到这一总量。

二

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社会人口出于各种社会和自然原因，流徙迁出相当频繁，造成人口数量发生很大变动。其中，流徙迁出的主要社会和自然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军事活动是造成人口流徙迁出的主要因素。

大蒙古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广大民众为了躲避战乱，纷纷流徙到周边地区。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阎复，其先平阳人，祖父仕金，歿于王事，父亲阎忠避兵迁徙山东高唐，立家而居。金末，潞州兵乱，宋子贞避走赵、魏之间。刘宣，其先潞人，金末避地于陕，后徙太原。^[40]

然而，这些民众的主要流向是不断南下，且以进入河南地区的数量为多。贞祐之初，金廷“以为应州已破，朔为孤城，其势不可守，乃迁朔之军民九万余口分屯于岚、石、隰、吉、绛、解之间”。贞祐三年（1215），金河北西路宣抚副使田琢上书提到，“河北失业之民侨居河南、陕西，盖不可以数计”。贞祐四年（1216），金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胥鼎曾言“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41]其间，“人争南渡而阨于河，河阳三城至于淮泗，上下千余里积流民数百万，饥疫荐至，死者十七、八”。^[42]郝经，其先潞州人，迁徙泽州陵川。金末，其父郝思温避乱于是河南鲁山。金季，泽州高平人宋天祚“随亲避兵河南”。^[43]

有元一代，陕西、四川的征戍军队大多来自山西地区。汉人世侯袁湘移镇延安之际，“临（州）民多携家来从”。兵乱过后，袁湘不仅“敦劝耕稼，裁抑游堕”，吸引河东之民“逾河而西”者不可胜计，而且还使这些民众能够“居借之庐，耕助之牛”。^[44]从而得以安居乐业。

中统、至元年间是山西地区签调出军的频繁时期。中统元年（1260），蒙古军征戍西川元帅纽邻从河东山西取兵一千一百人。^[45]中统四年（1263）春正月，忽必烈敕李平阳（即李穀）所部出征西川戍青居山，其各翼军在青居山者悉还成都。十二月，诏令益都元帅钦察统领凤翔屯军、汪惟正青居等军、刁国器平阳军，戍虎啸寨。至元四年（1267）春正月，陕西行省以开州新得复失，奏请益兵，忽必烈敕平阳、延安等处签调民兵三千人。同年，宋军包围开、达诸州，忽必烈以史枢为左壁总帅，佩虎符，统率河南、山东、怀孟、平阳、太原、京兆、延安等军。二月，忽必烈下诏遣官签调平阳、太原人户为军，除军、站、僧、道、

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等户以外，于系官、投下民户、运司户、人匠、打捕鹰房、金银铁冶、丹粉锡碌等各种人户中“验酌中户内丁多堪当人户”，签军二千人，定立百户、牌子头，由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所辖出征东川。^[46]是年，还“以平阳、河中屯民为军”，程松以千夫长率军戍守成都。

山西地区的汉军诸部征戍陕西与四川等地之时，曾在一些地区屯田耕种，以给军饷。这些随军的屯田户有较多是来自于河东山西。元太宗七年（1235），蒙古汗廷“发平阳、河中、京兆民二千屯田凤翔”。^[47]中统元年（1260），山西地区有隶于凤翔屯田八百余人在屯罢后，兵不归属。^[48]中统二年（1261）冬十月，忽必烈诏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兵籍，毋令出征，务农耕屯以给军饷。这些种田户中不少人原本来自平阳路。此外，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的出军屯田置立于四川灌州之青城、陶坝及崇庆州之大栅头等处，其中为户一千三百二十八名，为田二百八顷七亩。平阳军屯置立于灌州青城、崇庆州大栅头，为户三百九十八，为田六十九顷六十五亩。

除了陕西、四川以外，山西地区的签调之军还被派遣到其它地区征戍服役。中统二年（1261）十月，签括西京两路官民，有壮马皆从军，且命宣德州杨庭训统领，“有力者自备甲仗，无力者官与供给”。至元十一年（1274）夏五月，元廷“将有事于南服，桓桓兵甲，例作于晋”。当时，平阳路判官王恽亲自分阄待命出征的泽、潞之兵。^[49]至元十二年（1275）六月，元廷签调平阳、西京、延安等路达鲁花赤弟男为军。至元十四年（1277）春正月，忽必烈诏西京等路“编民捕猎等户，签选丁壮军二千人，防守上都”。至元十九年（1282）七月，以隆兴、西京军士代替上都戍卒归还西川。起初，上都屯戍军中士卒的奥鲁皆在西川，而出戍西川者，多为隆兴、西京军士，每岁转饷，不胜劳费。至元二十一年（1284），籍河东诸路蒙古军子弟四千六百人隶属土土哈麾下统领。^[50]出军服役的地点不详。大德七年（1303）二月，命令西京也速迭而与大都所起之军，皆以四月至上都，五月赴北。上述种种社会人口的流徙迁出均为军事活动所造成的。

第二、天灾人祸是人口发生流徙迁出的重要因素。

有元一代，各种大小水旱饥荒频仍不绝，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这种天灾人祸造成大量流民迁徙四方，对于山西地区的人口数量及其分布具有较大影响。己卯（1219），吉州城陷，后有凶年，“人皆逃散，阖邑无人仅十余载”。^[51]至元二十八年（1291）三月，平阳、太原饥谨尤甚，民众流移就食者六万七千户，饥而死者三百七十一人。天历二年（1329）六月，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流民十数万。绛州太平县“编户四十九社”，领以四乡，南曰：德进，西曰：义泰，北曰：景云，东曰：万春。其后，天有大旱，人民“死徙过半，并为五社”。^[52]这一时期的赋役繁重、苛求无已的人为祸害，亦使广大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这种流民迁徙不仅对于稳定各地社会秩序的为害不浅，而且还给社会生产与赋税收入带来不利影响。

第三、行政管理的隶属关系亦是人口流徙迁出的特殊原因。

兴和路原为忽必烈所设路份，所谓每岁“北巡东出西还，故置有司为供亿之所”。至正年间，周伯琦跟随元顺帝往来上都之时，见到兴和路“城郭周完，闾闾丛夥，可三千家，市中佛阁颇雄伟”，诗中所言“编氓半土著”出于当地居民仅占所有人口半数。由于兴和路属于河东宪司的按部所在，以至成为山西民众的迁徙之地，所以人称“西抵太原千余里，郡多太原人”。^[53]

不过，山西地区的守土观念、传统习惯与不同追求对于人口的迁移及其分布亦有一定影响，致使部分民众留在河东山西。壬辰（1232）之乱，临晋人樊氏“保族完家，不离乡土”。金末，“人多逃难于河南”，因知谢天吉素有“宽人之度”，来附河中府者数千人。^[54]留在山西地区不去。傅仁义，世居代郡。贞祐兵乱，北徙云中大同县。^[55]

金末之际，大批难民在蒙古军进入陕西、河南以后，转而开始向北流徙。汴梁城破前后之间，许多难民开始流入山西地区。当时，平阳路是北徙难民的主要居地，这些难民主要来自于陕西、河南与河北等地。

金兴定间，蒙古军残破关陕，孙履道先人携家避难于中条山的苍龙谷。^[56]壬辰（1232），云内人孟攀鳞在汴京城破后，北渡而归，居住平阳。^[57]何修幼世为汴之大家，金末兵祸幸免于难，遂迁蒲坂。^[58]真定人李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之间，后由崞县迁居太原，又至平定。^[59]李庭，陕西华州奉先人，北渡寓居平阳董府君之馆，“教授生徒”。^[60]癸巳（1233），陕西长安人毛彪避乱流落到山西地区，生子毛翼于河中府。

金亡以后，河北霸州信安人杜瑛“转居汾、晋之间，授徒为业，声闻渐著”。^[61]许国祯在河南被攻占后，从避难之地嵩州永宁县归寓太原。浑源人雷膺之母侯氏则挈子北归浑源。^[62]河内李氏族人有二孤子流落上党。^[63]晋北浑源则是“南渡衣冠多盛集”的避难之地。^[64]

随着战事结束与社会局势的逐渐稳定，山西地区的不少民众开始返回故里。忻州是蒙古郡王乞忒的属地。经兵革后，“户口逃散，农业废弛”。戊子（1228），忻州升为九原府，主帅郝和尚拔都“抚慰安集，简其徭役，无所侵扰，民得苏息”。^[65]西京、平阳、太原、京兆、延安五路万户梁瑛以“太原甫定，民多离散，悬闻于朝，给复三年，于是，四方来归者三万余户”。^[19]然而，并非所有山西地区的外迁之民均都返回故里，不少人在迁徙到其它地区以后，便定居到当地生活。潞州长子人宋衡避地襄阳，已而北归，屏居河内者十五年。^[66]任氏之先，世为西京人，中统初年徙往河南。^[67]

元统治者在征服与统治山西地区的过程中，不仅留驻各种军队进行镇戍，而且促使许多漠北蒙古部众迁移流入，造成河东山西以外各族人口的大批迁入，形成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军队包括蒙古军与探马赤军。其中，蒙古军兵马都元帅塔察儿所率部众与克呼的前辈便屯驻在河东闻喜，其子孙后代定居在此。^[68]所谓“既定海内，以蒙古一军留镇河上，与民杂耕，横亘中原”。^[69]中统三年（1262）三月，真定、彰德、邢州、洺磁、东平、大名、平阳、太原、卫辉、怀孟等路，仍有旧属按札儿、孛罗、笑乃？、阔阔不花、不里合拔都儿等官所管辖的探马赤军人。^[70]

山西地区邻近塞北草原，成为蒙古部众迁移流入的主要地区。大蒙古国时期，“戎马营屯，星散汾、晋之间”。^[71]刘祁作诗提到“入塞尽穿氈帐过”的移民情形。^[72]太原路有的地方则是“营帐驿传项背相望”。^[73]太原城内有一条街称作“达达巷”，是蒙古人集中居住的地方。^[74]平阳路术赤后王的“一道细分”表明有相当数量的蒙古部众留驻在河东山西。

有的诸王还往山西地区派出私属征收赋税，以致长期留驻不去。伯德那，西域板勒乞城人。蒙古军西征之时，举族归附，服侍诸王旭烈兀，授为河东民赋副总管，即旭烈兀在山西地区征收赋税的代表人物。伯德那起初定居在河中猗氏县，后徙解州。伯德那之子察罕生于河中，后任行军府奥鲁千户出入湖广、江西两省，多著勋绩。皇庆元年（1312），出职平章政事等职，致仕乞归解州居住。^[75]

元朝时期，山西地区三个路份的蒙古人户在原有数量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大同路尤其如此。中统二年（1261），伊聂济地贫民迁移就食平阳、太原等地。中统三年（1262）夏四月，忽必烈以米千石、牛三百给西京蒙古户。^[76]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廷籍河东诸路蒙古军子弟四千六百人隶于土土哈麾下。此外，元廷将边藩重寄，辅翼大都的河东山西交给部分蒙古诸王率部留驻，同样促使大批外来人口迁移流入。至元二十二年（1285），蒙古诸王阿只吉失律。^[77]丧失掉其在西北地区的统军权力转到山西地区。其后，阿只吉一度留驻在河东山西的西京、太原两路。《蒙兀儿史记》提到，阿只吉“袭领本部军在西京、太原”。^[78]至元二十五年（1288），“阿只吉大王、诸王驸马、王府官员在管州屯军三载，骐驎盈郊，貔貅塞野”。^[79]至元二十七年（1290）十一月，大同路许多蒙古人冒名支粮时，有司置有千户、百户十员，且以达鲁花赤总领蒙古人户。诸王海都在西北叛乱后，“其民来归者七十余万，散居云、朔间”。^[80]至元二十八年（1291），诸王小薛在上党获赐牧地。由此，小薛部众开始进入山西地区。

大德二年（1298）十二月，元廷又以潞州田地二千八百顷赐予小薛。泰定元年（1324）春正月，元泰定帝召亲王阿木哥于大同。不知这个阿木哥在大同是否设有府邸，如果设有府邸的话，当会带有相当数量的随从部众。天历二年（1329），岚、管、临三州还居住有蒙古诸王八剌马、忽都火者等部。^[81]

外来汉军亦有部分军队留驻山西地区。有些军队在参加各地的征战以后，将掳掠的不少人口带入河东山西。灭金之初，汉军将领奥屯世英奉命镇守河中，便“挈河南俘民老幼九千口”。^[82]契丹人萧君弼随从窝阔台汗伐汴之时，“俘户几四百”，由于“兵荒之余，所至艰食，复虑北方地寒，众必难保，独取壮健五十户，以北至应州，择沃土居”。后来，该地逐渐形成聚落，名曰萧家寨。^[83]临晋姚卓村的白龙庙内有一铁鼎制造于元代，上面镌有广东民众被兵掠到河中府河中县的迁居情况^[84]，这部分广东人大概是在平宋以后被掳到山西地区的。

四

元朝末年，元统治者腐败不堪，日益没落，阶级矛盾与民族压迫与日俱增，经济压榨更加残酷，致使农民暴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其间，元统治者的内讧迭起，愈演愈烈，逐步扩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随后，明军北上讨伐元军，攻取山东，进兵两河，最终彻底摧毁元朝的腐朽统治。

这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与各种灾害的严重影响对于山西地区的社会人口造成明显而又复杂的重大变化。河东山西社会人口的流动耗损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北方红巾军进入山西地区前后不仅造成大批人口的不断流入，而且还使许多人口滞留在河东山西。元末，河南地区“烟尘四起”，“人民逃窜，烟火甚稀”。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人魏成甫与乡邻徐、吴二姓逾越太行山，北行流入武乡县南，且与当地居民营窟而居，“暂僦其间”。^[85]陕西人党志善避乱徙家于榆次东阳里。^[86]至正十七年（1357），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率领北方红巾军进入山西地区，这支军队的人数究竟多少，虽然未见统计数字，但却肯定不在少数。中路红巾军在离开河东山西之时，当有不少被俘、投降与散失人口滞留在河东山西。

其二、元廷调动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的勤王军队进入山西地区戡乱戍守，保卫京畿。这两大军事集团的人数同样未见统计数字，当不少于进入河东山西的北方红巾军的人数。

其三、察罕帖木儿多次调动山西地区的军队出晋征讨北方红巾军，致使一批人口离开山西地区。至正十九年（1359），察罕帖木儿大发秦、晋之军会师汴梁。^[87]在镇压山东红巾军的决定性战役中，察罕帖木儿“皆调兵于晋”。^[88]至正二十一年（1361）六月，察罕帖木儿总兵征讨山东红巾军，再次大批征调晋、并之军出井陘，辽、沁之军出邯郸，泽、潞之军出磁州。^[89]

其四、元末各种敌对势力在中原汉地长期攻杀，连兵不解，除了造成各自军队的大量伤亡以外，还使黎庶百姓“肝脑涂地”。^[90]山西地区同样是战乱不息，受祸不小，人口耗损的数量颇大，只不过比山东、河南与河北较轻而已，并非处处都是烽烟不起，平安无事的世外桃源。北方红巾军进入河东山西以后，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流徙，有的地方“杀人如麻道路绝，狐兔巢穴严”。^[91]泽州高平县“长吏死之，民之死者亦众”。^[92]至正十八年（1358），北方红巾军过隰州蒲县时，“四野萧然一空”。^[93]绛州太平县的五社编户在北方红巾军入境之后，“止二百余家”。至正二十二年（1362）“并为二社”^[94]，人口减少将近五分之三。根据《闻喜县志》表列当地族谱所示人口的存留分析，许多族姓“皆绝于元明之际，必当日之民不死即逃，平定而归者寥寥，故无一家继续弗绝者”。^[95]平阳路临晋一直是农业生产与水利建设的发达地区，但在元末丧乱之时“抛荒独多”。^[96]

尽管如此，元末明初山西地区的社会人口却出现了急剧增长。若照上述史料来看，这种社会人口的增长现象并非源自本地人口的自行繁衍，因而不完全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出自于“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的地理条件，或是较少遭到水旱蝗疫与战乱动荡的不利影响，以致形成较之相邻地区“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社会情形。^[97]因为仅据若干史料，山西地区在元末年间就发生过几次较大灾疫。其中，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冀宁保德州大疫。至正十三年（1353）十二月，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至正十八年（1358），汾州大疫。^[98]《定襄金石考》中的《朔开便益渠记》记载，至正年间，河东山西“三路民罹，糊口粮绝”，百姓纷纷“逃迹散于他所，饿殍尸于塗巷者十有六七”。^[99]

关于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人口问题，路遇等人在《中国人口通史》中的统计分析指出，按《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七年（1270）三路（山西地区）人口，合计 50 多万（金朝约千万左右），与实际相差过于悬殊。元末战乱，河东山西战祸严重，十几年战乱不息，人口耗损较大，但在洪武十四年（1381）统计民籍，竟有人口 403 万。该著认为，尽管至元以后人口会有增长，但不可能有七八倍的增长，这说明金朝遗民基数较高，只是绝大部分没有编入民籍。分析估计元末战乱以前，山西人口当有 600 万左右，否则经过大战乱后的明朝初年，不可能仍有人口 400 多万。^[100]这些说法是否准确，有待于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确定。

路遇等人所说元末战乱期间山西地区社会人口的耗损较大，至元以后人口不可能有七八倍增长的有关论述确有见地，然而，提出有关至元七年（1270）50 多万人口与洪武十四年（1381）403 万人口之间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个世纪中仍未编入户籍造成人口误差的这一推论值得考究。同样，路遇等人所说元末战乱以前山西地区的社会人口当有 600 万左右的说法亦有疑窦。那么，山西地区的人口发生急剧增长的真实原因究竟何在呢？

根据有关史料记述可以发现，元末之时，河北、山东与河南的灾害饥荒频仍不绝，瘟疫流行时而发生^[101]，特别是黄河泛滥，蝗、旱灾害十分严重。至顺四年（1333）六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余，饥民四十余万”。元统二年（1334）三月，“山东霖雨，水涌，民饥”。后至元三年（1344），京师、河南、北水溢，御河、黄河、沁河、浑河水溢，没人畜、庐舍甚众。至正三年（1343）五月，黄河决白茅口。至正四年（1344）正月，黄河又决汴梁。五月，“大霖雨，黄河溢，平地水二丈，决白茅堤、金堤，曹、濮、济、兗皆被灾”。八月，“山东霖雨，民饥相食”。^[102]是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以致“田园荒芜，蒿藜没入，狐兔之迹满道”。^[103]至正十六年八月（1356），黄河决口，山东大水。至正十九年五月（1359），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壑尽平，民大饥。^[104]

田卫平所撰《明代河北移民问题刍议》一文指出，元代北方的每次大蝗、旱、涝灾害，往往以河北为重，所涉及面尤广，因而元代后期河北人户更少。^[105]山东与河南在元末中遭受黄河决口泛滥的为害至深。比较而言，山西地区虽有不少旱、涝灾害，但是，整个地势居高临下，不受黄河决口泛滥的大灾侵袭。此外，尽管腹里地区蝗灾分布较广，但是，山西地区遭受蝗灾侵袭次数不多，受害面积并不很大。这主要是由于“蝗生之缘必于大泽之旁”^[106]，而山西地区缺少适宜蝗虫生长的气温、水湿、地形及土壤等各种条件。^[107]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元末明初，河北、山东、河南与陕西是元军与北方红巾军进行战争的主要战场。大战之后，“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接着，元末上层统治集团的内讧不断，争斗迭起。随后，元军与明军展开多年的剧烈争夺，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口耗损与迁徙流失达到极为严重地步。其间，“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中原诸州“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108]山东、河南遭受战争破坏最重，所谓“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来，尽化为榛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109]，许多地方“多是无人之地”。^[110]至正二十五年（1365），扩廓帖木儿率军离开河南，驱民北撤。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率军从河南汴梁出发，往徇攻取河北州县，沿途见到“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111]，流民相望。河北地区“田多

荒芜，居民鲜少”^[112]，有的地方茅草丛生，野兽出没，“弥望草棘，蔚为茂林”。^[113]陕西地区则“张思道、李思齐交兵侵扰，加之岁旱粟不登，民多饥死”。^[114]

在连续不断的天灾兵祸中，这些地区的广大民众不是饥寒交迫，外出逃荒，便是避兵流徙，奔走他乡。与此相反，山西地区虽然亦有战事发生，但却因为处处有险，遇有兵乱往往可以躲避一时。因此，元人钟迪的《河中府修城记》提到：至正年间，“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115]至正十六年（1356），北方红巾军在陕西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之时，关中地区兵荒马乱，动荡不安，而“河东山川人民熙熙，禾稼丰登，牛羊散野，余粮栖亩，俨然太平气象”。^[116]

由于山西地区社会秩序较为稳定的特殊条件，所以促使山东、河北、河南与陕西流徙过来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多，最后导致河东山西成为大批民众源源不断涌入的避难之地，尤其是晋南地区在兵乱之中流入积聚起大批的外来人口。因此，与其说是元末战乱以前山西地区的社会人口当有 600 万左右，还不如说是在元朝末年的自然灾害与社会战乱中周边大批流徙民众不断涌入河东山西，从而造成社会人口的急剧增长。正是在这种人口急剧膨胀的社会状况下，山西地区为明初著名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创造了可能与必要的前提条件。

综上所述，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社会人口起初出现大量人口的死亡减损。忽必烈即位以后，实行恢复发展农业、手工业的施政措施，将“户口增”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标准，促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人口数量逐渐增长，直至元末。其间，河东山西社会人口的流徙迁出与流入定居发生显著变动，且在元末涌入大批人口，从而造成社会人口的急剧增长。

参考文献

- [1] 毕士林. 中国人口 [M]. 山西分册,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9 年; 路遇等. 中国人口通史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张青. 洪洞大槐树移民志 [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 [2] 毕士林. 中国人口 [M]. 山西分册, 第 31 页.
- [3] 赵秉文. 滏水集 [M]. 卷十一, 《梁公墓铭》.
- [4] 续文献通考 [M]. 卷十二, 《户口一》; 韩茂莉. 辽金农业地理 [M]. 第 199 页.
- [5] 湛然居士文集 [M]. 附《耶律公神道碑》.
- [6] 姚燧. 牧庵集 [M]. 卷四, 《序江汉先生事实》.
- [7] 道家金石略. 第 466 页, 《鄆陵黄箬大斋之碑》.
- [8] 元好问全集 [M]. 上, 卷二十八, 《广威将军郭君墓表》.
- [9] 李俊民. 庄靖集 [M]. 卷八, 《大阳资圣寺记》.
- [10]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 [M]. 卷三十九, 《堆金塚记》.
- [11] 元好问. 新修学记 [C]. 寿阳县志 [A]. 光绪己卯续修本, 卷十一, 《艺文下》.
- [12] 甘水仙源录 [M]. 卷八, 《知常姬真人事迹》.
- [13] 元好问全集 [M]. 下, 卷三十七, 《兴定庚辰太原贡士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引》.
- [14] (明) 李侃, 胡谧纂修. 山西通志 [M]. 卷十五, 《絳州节度使刘公墓碑》.
- [15] 李俊民. 庄靖集 [M]. 卷八, 《泽州图记》.
- [16] 安熙. 默庵集 [M]. 卷五, 《石峰府君行状》.

-
- [17]元史[M].卷二,《太宗纪》;卷五十八,《地理一》.
- [18]邱树森,王颢.元代户口问题刍议[A].元史论丛[C].第二集.
- [19]朱昱.嘉靖重修三原志[M].卷十,《忠定郝公神道碑铭》.
- [20]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M].卷九十六,《玉堂嘉话》.
- [21](清)觉罗石麟修,储大文纂.山西通志[M].雍正十二年,卷一百九十六,《李公荣祖政绩碑》.
- [22]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M].卷四十九,《南鄆阿氏家传》.
- [23]元史[M].卷一百二十四,《速哥传》.
- [24]续文献通考[M].卷十六,《职役二》.
- [25]元史[M].卷一百六十三,《李德辉传》;元朝名臣事略[M].卷十一,《左丞李忠宣公》.
- [26]元史[M].卷五,《世祖二》.
- [27]大元圣政国朝典章[C].典章十七·户计[A].典章五十四·擅科[A].
- [28]续文献通考[M].卷三十二,《国用三》.
- [29]元史[M].卷十五,《世祖十二》.
- [30](民国)何修燊,冯文瑞等纂.万泉县志[M].民国六年石印本)卷一,《輿地》.
- [31](民国)赵祖抃修,吴庚,赵意空纂.乡宁县志[M].民国六年刊本,卷八,《金石记》;卷十二《文选上》.
- [32]石刻史料新编[M].地方类/山西省,《碑记》.
- [33](清)白鹤修,史传远纂辑.武乡县志[M].乾隆五十五年刊本,卷二,《贡赋》.
- [34]元史[M].卷一百五十四,《郑鼎传》.
- [35]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M].卷三十七,《平阳临汾县新廨记》;卷五十二,《绛州重修夫子庙碑》.
- [36]姚燧.牧庵集[M].卷二十八,《河东检察李公墓志铭》.
- [37](明)永乐大典[M].卷七千五百十一,《仓库》.
- [38]元史[M].卷五十八,《地理一》;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M].第10页.
- [39]明史[M].第十七,《地理二》.
- [40]元史[M].卷一百六十,《阎复传》;卷一百五十九,《宋子贞传》;卷一百六十九,《刘宣传》.
- [41]金史[M].卷一百二十二,《吴僧哥传》;卷一百二,《田琢》;卷一百八,《胥鼎传》.
- [42]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M].卷三十六,《先大父墓铭》.
- [43]元史[M].卷一百五十七,《郝经传》;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九,《宋翼碑》.
- [44]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七,《袁湘碑》.
- [45]元朝名臣事略[M].卷十,《宣慰张公》.P207.
- [46]元史[M].卷一百四十七,《史天倪传》;卷九十八,《兵志一》.
- [47]姚燧.牧庵集[M].卷二十四,《武略将军知弘州程公神道碑》.

- [48]元朝名臣事略[M].卷十,《宣慰张公》.
- [49]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M].卷六十三,《兵次孟津祭灵源王文》;卷七十一,《游泽州青莲寺题示》.
- [50]元史[M].卷九十九,《兵二》;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传》.
- [51]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四,《后土庙重修记》.
- [52](清)劳文庆,朱光绶修,娄道南纂.太平县志[M].光绪八年刊本,卷二,《建置》.
- [53]周伯琦.扈从集[C].兴和路[A].后序[A].
- [54]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一,《樊氏先莹记》;卷二十九,《谢天吉碑》.
- [55]许有壬.至正集[M].卷六十,《傅公墓碣铭》.
- [56]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中条孙氏先莹碑铭》.
- [57]元史[M].卷一百六十四,《孟攀鳞传》.
- [58](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卷十五,《河东郡公何公神道碑》.
- [59]元史[M].卷一百六十,《李冶传》.
- [60]李庭.寓庵集[M].卷八,《故谥议李公墓碣铭》.
- [61]苏天爵.滋溪文稿[M].卷二十二,《元故徵士赠翰林学士谥文献杜公行状》.
- [62]元史[M].卷一百六十八,《许国祯传》;卷一百七十,《雷膺传》.
- [63]虞集.道园类稿[M].卷四十五,《河内李氏新莹碑铭》.
- [64]元好问全集[M].下,卷四十一,《饮浑源岳神仙会续增》.
- [65]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一,《梁瑛碑》.
- [66]元史[M].卷一百七十八,《宋衍传》.
- [67]虞集.道园类稿[M].卷四十五,《任氏先莹碑》.
- [68]瞿大风.元朝统治下的山西地区[M].博士论文,2003年.
- [69]虞集.道园学古录[M].卷二十四,《曹南王世勋碑》.
- [70]元史[M].卷九十八,《兵一》.
- [71]甘水仙源录[M].卷六,《栖真子李尊师墓碑》.
- [72]元诗选[M].(一)卷四,《送郡侯段正卿北行三首》.
- [73]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四,《张安宁墓表》.
- [74]郝树侯.太原史话[M].增订本,第30页.
- [75](清)马丕瑤,魏象乾裁定,张承熊纂修.解州全志[M].光绪七年本,卷八,《人物》P40.
- [76]续文献通考[M].卷三十二,《国用三》;元史[M].卷五,《世祖二》.
- [77]元朝名臣事略[M].卷二,《丞相东平忠献王》;元明善.清河集[M].卷三,《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 [78]蒙兀儿史记[M].卷四十二,《阿只吉传》.

-
- [79]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七, 《管州知州玉律徒德政记》.
- [80] 元史[M]. 卷一百七十三, 《马绍传》.
- [81] 元史[M]. 卷十九, 《成宗二》; 卷一百二十八, 《土土哈传》; 卷十六, 《世祖十三》; 卷一百七十三, 《马绍传》; 卷二十九, 《泰定帝一》; 卷三十三, 《文宗二》.
- [82] 李庭. 寓庵集[M]. 卷七, 《奥屯公神道碑铭》.
- [83] 刘敏中. 中庵先生刘文简文集[M].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卷六, 《大同县子萧公神道碑》.
- [84] (民国) 俞家骥主修, 赵意空纂修. 临晋县志[M]. 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卷十三, 《金石记》.
- [85] (清) 白鹤修, 史传远纂辑. 武乡县志[M]. 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卷三, 《寓贤》.
- [86] (清) 俞世铨, 陶良骏总纂. 榆次县志[M]. 同治元年刊本, 卷九, 《侨寓》.
- [87] 明史[M]. 卷一百二十二, 《韩林儿传》; 元史[M]. 卷四十五, 《顺帝八》.
- [88] 山右石刻丛编[M]. 卷四十, 《大元祠河清记》.
- [89] 元史[M]. 卷一百四十一, 《察罕帖木儿传》; 卷四十六, 《顺帝本纪》.
- [90] 元史[M]. 卷一百八十六, 《张桢传》.
- [91] 张蜕庵诗集[M]. 卷二, 《并州歌送张彦洪使毕还河东》.
- [92] (明) 李侃, 胡谧纂修. 山西通志[M]. 卷十三, 《重建高平孔子庙记》.
- [93]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九, 《蒲县东岳庙碑》.
- [94] (清) 劳文庆, 朱光绶修, 娄道南纂. 太平县志[M]. 光绪八年刊本, 卷二, 《建置》.
- [95] (民国) 余宝滋修, 杨韞田等纂. 闻喜县志[M]. 民国八年石印本, 卷十二, 《民族》.
- [96] (民国) 王正茂纂修. 临晋县志[M]. 乾隆三十八年刊本, 卷六, 《杂记》.
- [97] 张青主编. 洪洞大槐树移民志[M]. 第 209 页.
- [98] 元史[M]. 卷五十一, 《五行二》.
- [99] 定襄金石考[M]. 民国铅印本, 卷四, 《荆开便益渠记》.
- [100] 路遇等人. 中国人口通史[M]. 第 619 页.
- [101] 张青主编. 洪洞大槐树移民志[M]. 第 37-46 页.
- [102] 元史[M]. 卷三十八, 《顺帝一》; 卷三十九, 《顺帝二》; 卷四十一, 《顺帝四》.
- [103] 余阙. 青阳先生文集[M]. 卷八, 《书合鲁易之作颍川志教歌后续集》.
- [104] 元史[M]. 卷四十四, 《顺帝七》; 卷四十五, 《顺帝八》.
- [105] 田卫平. 明代河北移民问题刍议[J]. 河北师院学报, 1988, (2).
- [106] 徐光启. 徐光启集[M]. 卷五, 《屯田疏稿·除蝗第三》.
- [107] 王培华. 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 (1).
- [108] 元史[M]. 卷一百八十六, 《张桢传》; 明太祖实录[M]. 卷一百七十六.

- [109] 宋端仪. 立斋闲录 [M].
- [110] 顾炎武. 日知录 [M]. 卷十, 《开垦荒地》.
- [111] 明太祖实录 [M]. 卷十八; 卷三十三.
- [112] 明史 [M]. 卷二, 《太祖二》; 明太祖实录 [M]. 卷一百九十三.
- [113] 高岗. 关于明初河北移民的考察 [J]. 河北学刊, 1983, (4).
- [114] 明太祖实录 [M]. 卷四十七.
- [115] (清) 周景柱等纂修. 蒲州府志 [M]. 乾隆二十年刊本, 卷十九, 《河中府修城记》.
- [116] 山右石刻丛编 [M]. 卷三十九, 《刘尚质吉州诗》.

Social Population of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QU Da-fe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Abstract: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Yuan Dynasty, Mongol Army not only slaughtered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but also captured many ones as slaves or subordinates. Therefore, the social population of Shanxi Region lost very serious. After Khubilai ascended the throne, the population of Shanxi Region increased step by step. However, the population of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had not surpassed the one of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Jin Dynasty. In addition, the population of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moved very frequent so as to cause major change in of the population, among which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emigrated from Shanxi Region and many ones immigrated in Shanxi Region. the population of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brought about obvious increase to lead to the immigration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Yuan Dynasty; Shanxi Region; Population

收稿日期: 2008-05-10;

作者简介: 瞿大风 (1954-), 男, 汉族, 浙江杭州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元史研究。